

陈丽瑜老师访谈

受访者

1974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78年毕业留校，一直担任法语老师，主要从事基础法语教学，对法语教学法、欧洲联盟发展史有所研究。在北外工作期间曾任法语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在职业生涯中，曾被教育部推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4年，被外交部借调，跟随丈夫到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工作4年，到驻布隆迪使馆工作4年，201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

采访者

罗舒婷、卞艺文

老师您好，您的求学经历很丰富，曾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巴黎大学和法国斯特拉斯堡舒曼大学深造。您最早接触法语是什么时候呢，学习法语的初衷是什么？有什么难忘或者有趣的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974年，我作为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得到了北外入学面试的机会。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招生模式下，我是幸运的，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那时候学什么专业是由学校分配决定的，我就这样被分配进入了法语系，开始了法语的学习之旅，从此与法语学习和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个年代，能够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很少，学生们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人人学习都很刻苦。当时规定教室和寝室晚上11点钟熄灯，只有走廊、厕所不熄灯。为了学习，有些学生会利用走廊，甚至厕所里的灯光读书。我当了老师之后，会经常感慨现在的学生学习劲头不如我们那时，有些学生考上大学后就松懈了。我经常对学生说：你们的干劲真的是不如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初中毕业之后就上山下乡，从事体力劳动，文化基础不是很扎实。但上山下乡的经历培养了我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学习上总有使不完的劲。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很喜欢参加体育锻炼和义务劳动，当时教学楼里的卫生打扫工作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各个班分小组轮流打扫，下了晚自习后负责拖楼道和打扫厕所。现在的学生可能对此不屑一顾。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学校特别提倡互相帮助。班里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个班最多15—16个人，分成3—4个小组，每个小组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练习口语。偶尔有同学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大家都会互相帮助，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一个同学掉队。老师晚上也会到班里辅导，非常认真，与学生打成一片。那个时候，我们用各种方法来促进学习。现在的学生入学时起点高，上大学时外语水平都很高了，也许不需要像我们那时需要下这么大的功夫。但无论怎样，我觉得学习外语这种勤学苦练的精神始终都值得提倡。

您当时是毕业即留校任教。从本科基础阶段法语教学到硕士研究生指导，您均曾参与。在多年的任教过程中，您的教学方法变化大吗，有哪些教学方法是一直适用的？

我1978年6月份毕业，9月份就当老师了，不过好在有前辈教师带领，金国芬

老师、董纯老师、董明慧老师、陈雅丽老师等有经验的老师都曾带领低年级教学团队，从教学方法到语言基本功进行指导，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新入职的教师。教学团队除了每周集体备课之外，新入职的教师必须去听老教师的课，老教师们也会来听我们上课，及时进行总结，指出优缺点，这使我们很快学到一些教学经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传统。

至于教学方法呢，有许多种，无论是传统的翻译教学法，还是后来出现的各种新的教学法，选择一个适合你教学对象的教学方法是最重要的。以前的教学方式和现在的教学方式肯定有很大的不同了：当时来自国外的信息不如现在多，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老师教学感觉就比较自如；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新媒体普及等等，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了，这对于教师也就有了更大的挑战。而且多媒体时代的学生更喜欢图文并茂的信息，年轻教师电脑操作娴熟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我一直教精读，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当时对我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注意到您在北外任教之余，也多次背上行囊，离开校园，参与了国际事务：像毕业后先在北外从事教育工作，6年后，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翻译处秘书5年，1990年又再次回归北外大家庭……像这样背上行囊出走，又回“家”的经历里，您有些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阔别经年的北外有哪些令人感动的变化？有哪些是没变的？

1984年，教育部来我们学校借调老师去国外工作，我离开北外，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这个职位只是一般级别的文件资料术语收集工作，不是翻译级的。虽然职位不是很理想，但是当时出国机会很少，能够到法国这样一个我们所学语言的母语国家工作，对了解法国政治制度、文化、人文等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因此这样一个机会对我来讲也很宝贵。那几年的经历让我收获颇多，我既了解了所在国的文化、政治体制等，也了解了国际组织运营的机制。同时我也交到了一些国际朋友。很有趣的是，在教科文组织还有一个乒乓球队，我们中文翻译科的几位同事作为主力，曾经代表教科文组织到意大利参加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乒乓球比赛，两天打球，三天在威尼斯旅游，真是开心至极。

1989年，我回到北外教书。发现学校发展很快，但当时学校的硬件没有太多改观。真正比较大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在大学里担任教学工作多是在象牙塔里和一群刚刚成年的孩子们一起相处和学习；而在使馆工作，环境会更加多元化。您认为哪一种职业的生活方式更适合您呢？

两种生活方式各有千秋。学生们单纯，充满活力。和学生们在一起，就会觉得自己很年轻。在外面工作时视野会比较开阔。在外面工作，人际关系会比较复杂些，要学会处理好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我的性格属于秘书型的，并不是很要强，与别人合作会比较融洽。我是那种领导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下属，同事之间也会互相帮助。我在外面工作的那几年里，人际关系都挺好的，我认为这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另外我在使馆工作时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为外交官夫人开设了法语课，有几位夫人还真学得不错呢，使我享受到教学的快乐。

我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又前后几次和我先生被外派去驻外使馆工作，中间有10多年没有从事教学工作。这对我做教学科研有一定的影响。出去之后再回来会发现自己和现实教学脱节了很多，我也就不能在研究领域深入地走下去。但是我心态很好，始终认为自己属于教书匠类型的，科研是个短板，因此也没有勇气申报晋升教授，最后从副教授岗位上退下来的。

您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同时，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翻译科任职。请问您是怎么平衡工作与学习的呢？

这要感谢我的恩师司徒双老师。1983年的时候，我跟随司徒双老师一起编纂《全国基础法语教学大纲》，她担任组长，我担任秘书。1984年我就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过了几年，司徒双老师和我在巴黎相遇，她当时对我说，我做这个工作（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负责术语收集工作）还是比较耽误法语教学的，不如去考一个文凭吧。之后她就亲自带我去了巴黎第三大学，找到了当时语言文学系的主任。我们沟通之后，主任觉得我的语言是没问题的，但还需要通过一个考试。9月份我通过了考试，10月份我就顺利入学了。能够注册硕士学位学习，一方面要感谢司徒双老师的引荐，另一方面，我能在工作时间去上课，要感谢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文翻译科科长程学鑫老师（当时他是咱们法语系的副主任，被借调到翻译科当科长）。我每个星期要在学校听4门课程，共8个小时，也就是每周要离开岗位4次，科长当时让我写了一个承诺书：离岗几个小时，下班后的时间里就要补回几个小时的工作，这也是制度规定的，能给予我这样的通融，真是很不容易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然是比较辛苦，记得有一

次，午饭时间后我需要立即去上课，当时赶地铁去学校，我已经累到脑袋迷糊，完全分不清地铁所去方向了。不过当时也还年轻，30岁刚出头嘛。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劳累的原因，我在巴黎大病一场，做了两次手术：1987年动了一次腹膜炎手术，因为麻醉剂过量，醒不过来，在手术室前后待了8个小时。第二年又动了肠梗阻手术。不过也是坏事变好事，在住院期间，每天能和医院里的护士、清洁员打交道，空余时间看电视，我尤其喜欢看侦探片，影片语速很快。出院后，我感觉我的听力进步了一大截。

值得一提的是，一次我在课堂发言后，我们的导师问我：“这位女士，你的法语在哪儿学的？怎么讲得这么好。”我说，就是在中国学的呀，学了整整4年才有机会来到法国的。那个导师就说：“那真应该研究研究中国的外语教学方法！”我当时感到特别自豪，这说明我们（北外）法语系的语言教学方法是很有成效的。

从法语系到法语学院，北外法语队伍逐渐壮大。您曾经在系内担任了6年的总支书记，在您任职期间，法语系的发展是怎样的，可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在此期间发生的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我从国外回来，在系里担任总支书记，和主任一起合作，很愉快；也有副书记和辅导员帮助我。此外，当时的就业已经是双向就业了：会有外来的招聘单位，我们会提供意见，介绍推荐合适的学生等等。我觉得呢，任何时候，一个领导班子一定要团结，要相互多一些理解和包容，才能和谐。很幸运，我和当时的同事关系都是很好的。我感觉自己不是个领导型人物，而是个秘书型或者说是服务型的干部，能和别人合作，可能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小吧，老是听哥哥姐姐的，不是很有主意。

2008年的时候您在马赛第三大学政治系，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和成果”为题进行讲学，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您有了这份经历呢？在1980年前后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革开放”：不同程度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而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40多年，您认为是因为什么样的不同之处使得我们达到今天的业绩呢？北外也一直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的高校，作为北外人的我们又能添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砖瓦呢？

这次讲学机会是我们法语系和马赛第三大学政治学院的交流项目。我们系好多老师都去讲过学。那次讲学除了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的讲座以外，

我还粗略地讲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但我对此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本身对法律研究也不是很深。这次法国之旅，我真正的收获却是在政治学院讲学工作之外。当时我认识一位外交学院的老师，她的先生和我先生都在外交部工作。她委托在马赛的朋友帮我找房子住。我很幸运。她的这位朋友刚好有一套空房子，还开车到火车站接我。我的这位房东对中国人特别友好。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个中法友好协会，还多次结伴来中国旅游过。他们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很多帮助。当时我们系办的赴马赛留学生班，这个协会每周都会组织他们到普罗旺斯地区参观、野餐。我到这个协会做了两场报告，结果反响比在政治学院里的还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展示了一些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后和开放前的照片进行对比，他们非常感兴趣，说中国的变化真的非常大。当即就有人提议组团再来中国。

我由衷地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其特有的优越性。在国外待得越久，就越加体会到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他们的物质生活确实很丰富，我们那个时候（1989年）回国带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我买了一个电视架子，非常先进，能够推来推去，而且还是镀金的。当时就觉得他们的东西很好。但是几年之后，戴冬梅老师留学归国之际问需要给我带些什么。我回答她，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是需要从法国带回来的，我们国内现在什么都有。无论是从综合国力，还是国际地位来看，中国真的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尤其从这次疫情来看，我国充分展示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我国疫情如此严重，可死亡人数却远远低于美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我们从各国应对疫情的措施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政府对老年人、年轻人一视同仁，只要是生命，就会全力以赴去救治。这不只是口头上的称赞，更是大家切身体会到的。我觉得在中国生活很好。咱们的退休制度也很好，曾在我们系工作过的外教们若干年后回到中国时，一致感慨中国的退休老人很幸福。而这些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在科技方面，现在国外的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技术，从航天到海底，技术都很先进。我们的海底隧道建造技术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还有我们的高铁技术，以前都是向国外学习，现在都已经可以出口国外了！现在学外语真的大有用武之地，机会比我们那个年代多。

寄语

我一直以我们法语系（学院）为豪，我先是在北外学法语，后来又是在北外教学，是个不折不扣的北外法语人，我对法语系非常感恩。值此建系70周年之际，我首先祝老领导们，我的老师们健康长寿；其次祝我院年轻一代的教师们工作顺利，教学事业蒸蒸日上。祝学生们，首先，要努力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其次，一定要有强烈的求知欲。不功利化学习，将知识融会贯通，未来的某个时刻你一定会受益于曾经学过的知识。再次，在校期间学生们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精力，防止本末倒置。最后，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学业有成！祝法语学院越办越好！